

Qinggeng Yudu Ji

# 晴耕雨读集

出版史札记



汪家熔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Qinggeng Yudu Ji

# 晴耕雨读集

出版史札记

汪家熔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版式设计:姚 雪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晴耕雨读集:出版史札记/汪家熔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01-014578-5

I. ①晴… II. ①汪…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G23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673 号

### 晴耕雨读集

QINGGENG YUDU JI

——出版史札记

汪家熔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307 千字

ISBN 978-7-01-014578-5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出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为汪先生序

李维民

十年前,我与汪家熔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偶然相识。当时他正为撰写《中国出版通史》晚清卷查阅有关资料;我为编写《中国年鉴概览》和《中国年鉴史料》,查阅晚清时期中国最早出版的几本年鉴。过去许多学者认为,1909年(宣统元年)出版的由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员谢荫昌辑译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中国人编译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年鉴。但是人们忽略了发起和组织这一开创性工作的,是时任奉天提学司使的卢靖。他不止出版了这一本年鉴,在1909年至1911年三年间,他还出版了《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和《欧美教育统计年鉴》。他为这四部年鉴题写书名、撰写序言,而且从找原著、请译者、审定书稿到印刷发行,都由他负责,应当是中国年鉴出版事业的创始人。

当我谈起此事时,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造诣颇深的汪先生向我介绍说,卢靖还有一项重要贡献,就是他最早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印刷出版,使这部在我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卢靖不应该被遗忘,介绍了卢靖为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此文便收入这本集子中。据汪先生考证,严复本人曾证实过卢靖最早出版《天演论》的事实。严复在《天演

论》译序中谈到,他原认为出版《天演论》“非当务之所急,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梁启超)、沔阳卢木斋(卢靖)诸君借抄,皆劝早日付梓”,从而印行于世。1905年《天演论》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因为梁启超已成“钦犯”,这条说明被删去,卢靖首刻《天演论》的历史贡献,也就被埋没了。

我在与汪先生的交往中获益良多。他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和著述,硕果累累。他对中国近代出版界的先驱,如数家珍,对出版大家张元济的研究尤为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张元济的日记、书札、诗文,出版了几种版本的张元济传,还有商务印书馆史等关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专著。他一系列的著作,包括这本文集,贯穿着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出版是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为社会与大众服务的崇高事业,而不单单是商业行为;出版人应当是具有远大志向、具有严谨求实作风的文化人,而不是唯利是图、低级庸俗的商人。

张元济就是这样高尚的人,卢靖也是这样的人。卢靖热心于出版事业,并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他自己反而要拿出许多钱来作出版的经费。他出版年鉴这种资料性的图书,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唤醒民众,奋发图强。他用世界科学发展、文明进步的事实,与当时腐朽没落的中国作横向比较,抨击盲目自信的愚昧无知。他在《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的序言中说:“弱也、昧也、乱也、亡也,其国人决不自知也。设自知之,岂有不思易弱为强,易昧为明,易乱为治,易亡为存者。其不自知之故,岂不原于无比较。自以为富也,而不知取世界各国之生产力而比较之;自以为强也,而不知取世界各国之海陆军而比较之……全国识字者之无多,尚自诩为文明古国,而不知取世界各国教育之美备以相较。”他希望“假吾国士夫治事之暇,案置此册,浏览而借鉴之,庶几能免于弱昧乱亡;且进而求夫所以兼攻取侮之策。是则印译此书之所祷祀而求者

也”。

张元济推动引进世界先进文化,比卢靖还早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北京办通艺学堂,自筹资金从上海聘请教师,教?京官和官员的子弟学习西学,从事培养社会精英的工作。1900年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使他感到对普通群众的教育更为重要。1901年10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处工作时,曾给盛宣怀一信,谈到当时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受教育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今中国之人与外国之人相比,何以异此,可不惧欤”。他认为不能专注于培养精英和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素质。他在1902年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十条建议,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他主张“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他提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他反对用四书五经做启蒙读物,也反对“沿用洋人课本”。他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为系统出版符合现代文明要求,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教学课本,花费了很大心血。1906年,他参与编纂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接着又出版了小学修身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他及时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在五四运动前三年,他就提议小学教科书应用白话文编写。经过多年努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教科书,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通用教材。张元济长期领导商务印书馆,为介绍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出版优秀图书,培养出版人才,壮大出版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汪先生在这本文集,特别在他的专著《张元济》中有详尽的介绍。

在汪先生这本文集中,还介绍或涉及众多出版大家,如陆费逵、叶圣陶等。不仅颂扬他们为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而且推崇这些先贤的求实精神和严谨作风。汪先生对出版史研究中一些违背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现象,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在《陆费逵对中国出

版事业的贡献》一文中,他指出郑逸梅编造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欺骗商务印书馆而使自己成功的故事,破绽百出,没有事实依据,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写入出版史教科书中。

汪先生认为:“随便写写,不考究真实,而是随意成文,这是出版史最犯忌的。其实任何文字都不能随意成文。”他列举了许多随意成文的事例,一一加以剖析。现在,随意编造故事,歪曲事实,甚至有意忘却众所周知的历史,已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今年汪先生已八十有六,仍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对于我国出版史中的桩桩件件,一丝不苟地进行着考证、辩诬和著述。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情。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

# 目 录

---

李维民：出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为汪先生序 / 1

出版目的之四次嬗变 / 1

承载民族复兴重任的近代出版 / 18

善待编辑出版史 / 33

软指标 1、3、7——寻觅记忆中的质量 / 46

官书局六题 / 56

“三琐记”：中国期刊之诞生 / 66

放心吧，纸本长在！ / 78

略叙郑振铎与脉望馆抄校本 / 82

抗战期间郑振铎抢救珍贵典籍的事迹——纪念郑振铎先生  
诞生一百一十周年 / 90

《童话》：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 / 95

早期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互补机制 / 101

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档案史料 / 112



- 讲史,第一要紧就是真实 / 126
- 看书,是研究出版史的唯一方法 / 130
- 令人咋舌的研究方法——评《张元济的出版人才思想》 / 132
- 《说文》里绝不能马虎的七个字 / 141
- 甲骨文和重器铭文不是出版物 / 147
- 善书:古代社会秩序之规范 / 152
- 淞沪“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真相 / 168
- 伪满教科书原记录 汪家熔 整理 / 176
- 陈衍学术概论——序《陈石遗集》 / 210
- 卢靖:不该被遗忘者 / 221
- 拳拳于文化传承的张元济 / 229
- 张元济:国若强盛何惜此身 / 239
- 陆费逵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100年前开始的历史 / 254
- 读叶圣老几本古文教学书的体会——正确领会陈云对古籍整理的指示 / 278
-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日子 / 284
- 从《清人别集总目》说起 / 292
- 蔡元培确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长——答张人凤先生 / 297
- 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 / 326
- 商务印书馆档案:前有“一·二八”,后有杨德炎 / 350
- 商务印书馆从未炒过股票——答柳和城先生 / 355
- 附:车轮:华夏贡献人类最大的第一大发明 / 364
- 后叙 / 366
- 续后叙 / 369

## 出版目的之四次嬗变

事物总是发展和变化的,出版的目的也逃不掉这个框框。

### 一、以不朽为目的的出版

出版一词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然这仅仅是所谓出版历史研究中的某种不同观点的反映。因而,这里所谈的自然只是一种观点。

出版从其本质意义讲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文字的复制和传播——文字记录、复制、传播三者缺一不可。出版的技术方法产生是很晚的,在之前的社会生活的记录和传播则是手工誊写、刻录。文字的功能是记录,当文字记录和出版结合后,传播就变得更久和更广、更远。把出版的技术看成是出版,把出版技术的变化看成是出版史,不免把出版的思想内容贬低了,思想内容究竟是出版物和出版的灵魂。技术仅仅在传播的方法和速度上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它是次生的、非主要的因素。当然这仅仅是我的观点。

我们既然承认出版是社会生活的记录,那么,同其他事物一样,社会的加速发展,必然影响出版这一活动的性质,或说目的。

社会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有怕死的本性,“好死不如赖活”再好不过说明了人的怕死。然而自然规律是不可抵抗的:有生必有死,于是有表达人相反意愿的“永垂不朽”四个字久久流传。既然是人

的本性，世界必然一样，当然会存在差别。古埃及人相信，死了的人灵魂不灭，灵魂仍然依附于一个物体，于是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以使其灵魂有所寄托。我们国人相信灵魂是人的另一种形态，可以独立存在，有所谓“鬼”的概念。既然是人“生存”的另一种形态，当然也要吃喝穿戴，要开支。历史上汉代经济基础好，似乎最阔气，于是有马王堆的不腐葬；死后穿金缕玉衣的有中山王，有汉武帝的叔叔刘武等人。他们相信玉器的功力能使尸体不腐烂，灵魂才能有长久的依附之处，等于仍然生活在世上。于是墓葬内不仅有冥器，甚至有大量当时的通货——黄金。曹操早期起兵，缺少军饷，就盗汉武帝叔叔梁王刘武的墓，所得黄金足以应付 5000 人三年军饷，可见墓内随葬黄金数量之大，已不属一般冥器范畴，而成刘武死后的金库了。

不死，古人很早就明白那是做不到的，于是就转而向死而能不朽的努力。什么才能称作“不朽”？《春秋左传》里有记载：《春秋左传·卷三十五》“《传》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乎？豹闻之，大（太）上有立德（注：黄帝尧舜）；其次有立功（注：禹稷）；其次有立言（注：史佚），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可见，《春秋左传》里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条件实在太高了。有谁敢和黄帝尧舜禹稷比高下！太高的标准于社会并无好处。孔子则提出了一个一般人努一把力基本可以达到的标准：他在《论语·宪问第十四》里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就为大家开创一个能够达到的话语的条件，因而基本上有了一个一般人够得上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可能。孔子真是功德无量，对增进社会

道德有着很大好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极大地鼓励读书人立言——不仅言能传世，而且表示他是“有德者”：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但“言”必须传播至众多的他人，才能成为“言”，才能不朽。这个传播的条件在古代很不容易，有两个难点：一是当时只能口口相传而没有能传播的物质载体，二是社会有了载体由谁来复制、再传播。到唐代才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之一。整个夏商周三代的诗才凑够三百多首，称作“诗三百”。而唐代几乎人人懂诗，李白杜甫写好后要念给村妇听，再修改。有了适当的文体，大家又喜爱，就有了传播渠道。但是这种传播只是横向的，大部分不能传之后世，离不朽还有一定距离。

印刷术很早就发明了，五代冯道有所说明和实践。到宋代版刻水平已经相当高，并经政府同意容许民间使用，这就使著作的复制方便了，开始有刻板，于是有技术上的“出版”（“出版”这一词汇，王益老考证，则是近代才产生的）。经过印刷，所立之言能在垂直向后世流传，达到今信后传。在整个清代，宋版书都认为是善本书，稀少的原因，除了时间的原因，宋版书还是离印刷术发明不远，还不是很普及，当时它就很贵族化：写底本的写家很讲究，所谓“字大悦目”，活体字，刻工也不容易。

古籍，从雕版开始，虽然具备了大量印刷的条件，但从来不是大量印的。印刷术虽很早就有，但没有相应的发行渠道，印刷由于需要制版，版的分摊成本视印量而定，而古代出版数量小而分摊成本很大，形成恶性循环：印量小而成本大，成本大而发行量小。但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封闭和经济不发达，文盲满天下，书籍尚属于部分有钱人的奢侈品，一般人没有了解他人思想的需要，所以发行量永远不会大。当时书籍的发行量很小，缘于读书和做官当时还没有必然联系。

私人雕版,雕版完成后,除掉自己刷一小部分送亲友外,就留待他人来刷了。清代仍然如此。一些衙门有所谓不属灰色的“羨余”,官员不据为己有而一般用来雕副版,供人来刷印,来刷印的人要付钱,称为赁版钱。这赁版钱就成为衙役的茶酒钱,也是离任官员留给衙役的口碑。这种版刻印的书现在还能见到,内封左下角,往往有“版藏本衙”字样,也算是广告吧。这种“版藏本衙”的书,一般是说畅销书;既然“版藏本衙”,就不会走得太远。

私人刻版,如果有人来刷印,是求之不得的事,就不必付赁版钱,而代之于给宅内仆人的酒钱,酬谢他将版片搬进搬出的劳动。

虽然早在扬雄就有“爱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的话,一般说,古代的市集没有那么多书店。晚清,提倡拼音的劳乃宣在直隶南皮县令任上,曾有一个禀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批发一些南方官书局刻印的书籍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支应局发卖。依此推论,天津和保定有书店的可能性都很小,更何论其他。

发行量不大而有出版,关键就在“不朽”一词。按孔子的标准,立言就能不朽,出版这就成为回报极大的“投资”活动——谁都能写几个字算作立言?你说过的、他说过的,我改动几个字,或照样,意思不变,刻出书来,亲戚朋友一送,传播开,也就是立了言而不朽了。

元代对刻书是提倡和统制相结合的。没见到对私人家刻的限制。

到明代,雕版的字体变化,反映了明代出版物的增多。我们现在所说的“宋体字”正确的名称是“明体字”——明代开始有的。这种字它有两个特征:第一,笔画横细竖粗,这由于以往汉字的结构横笔道多,竖笔道少的原因;第二,笔画横平竖直,这个特征是简化雕版刀法的原因:明体字写样上版后,先从左边往右用刀割横笔道,横笔道割完后将版转90度角,割竖笔道,并且随手剔去木屑,版就刻

成了。而宋版书的字是楷体，圆角多，笔道粗细不一，刻版费工费力。书版从费工的楷体转而用刻工简单的明体，反映了需求的增加，费用的减少，正是普及的表现。这就是所说从明代“家刻本”能增加的基本原因。

明代中后期社会从上到下人欲横流，却出现一种“书帕本”。这是官员致仕后回家乡用作送亲友的：一部书和一方丝织手帕。书表示他在任上清闲，有时间看点书、写点东西，也就是“清廉简政”的表示。帕的原因不明，许兴是用作包裹书籍的。这些都导致了家刻本的增加，也是“不朽”的增加。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给人钻了空子。孔子所谓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并不是只以口才。言为心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的言，是德者之言。而明季之当官者想表示清廉的书籍并没有德，所以并没有能挽救晚明的灭亡，或者说正是这些无德的官员从张居正去相以后几十年，把崇祯帝推上了煤山。

清取代了朱明，“不朽”的事业仍然延续着。说来奇怪，明代从万历元年开始有张居正的中兴，去相后到崇祯末年，计七十一年，最后没能挽救朱明的灭亡。晚清，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几十年，先有林则徐等一批清廉官员从事挽救活动，后有实力强大的洋务派的努力，也未能挽救清代的灭亡。缘于都是在大势已去，积习难挽，民不聊生，民非国家主人，民与政府两不相关，遂至溃烂而莫可救。这种状态下，出版，主流是私人的家刻，仍然非常兴旺。支撑的仍然是念念不忘的那为个人不朽而立言！立言是没有标准的，随便说说，刻成书都是言，都可以不朽。

德，家有余米剩柴，冬天煮粥，夏天烧茶，一般做些善事；功，在朝少贪些就是功了。清代实行低薪制，从任何官员到衙役，没有现在称为灰色收入的话，都没法活。而且从乾隆开始，他把“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推向极致。明确了国家的大小好事

都是皇上干的,不能说是臣子做的。他从根儿上紧握财政,化一厘银子都要“计划”和报销;地方官没钱难做好事。地方官员不可以减免绝户欠的一厘银子的田赋,少收一厘绝户的田赋都要报告皇上批准——皇恩浩荡!我看过刘坤一的集子,就有申请给监狱修厕所的报告。所以,做官没法立德立功,剩下的只有立言了。立言的唯一方法是出书。曾国藩那样讲究实际的官员,都在《劝学篇》最后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写书,不妨代人刻一部书,作为出版者,你的名字可以流传500年。大致亦算“半不朽”了吧!这种半不朽现在变为文化人晋级论文的“版面费”了!

这种为不朽而出书的活动状况,几乎占了古代出版物的大部。这种出版离开了出版的基本目的——传播。这种“家刻本”的基本内容是读书人年老后将自己的文字刻后送亲友,成为不朽。如果生前经济困难,则慢慢等子孙和学生有钱时刻。这些家刻本刻好后刷印几份送亲友,除极个别外,并不能在市场流通。因为古代经济不发达,每个县并没有书店,而每个县都有读书人;读书人因为穷才读书,需要熟读的,除四书外就是上一科中试者的试卷。前面提到的劳乃宣的禀里说,很多读书人不识四书五经的篇目(子目),也是说他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

这种出版状况,直到甲午战争才有所改变。

## 二、推动社会文化的出版

1840年鸦片战争,除掉三元里地区人民和林则徐、魏源等几位,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反映。魏源著《海国图志》,不久虽然三次修改、重印,前后有四个版本,受到日本人重视,在日本曾二十几次重印,却没有引作同道的国人呼应。最后他是以“集译”佛经《净土四经》,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的人生抱负社会不能够接

受。魏源译佛经是件不大为人知道的事,也是件令人鼻酸的事:一位在国家危亡之际跑在前沿的人,最后出世,以集译佛经了结最后岁月,亦可见他当年的热血已经冷却。

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并没有唤醒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国人。直到甲午战争,事情才发生变化。我们一直自诩为天朝大国,这时被蕞尔小国打败,这才引起读书人的关心。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开头就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当然是此时社会经济状况已大不一样:农村破产,失地农民进城,有了初步的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经济需要的一切已经有了初步基础。

在明末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清廷压迫了二百年后已经重又苏醒,从石头缝里钻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在北边筑长城,自然是防止入侵。现在掠夺者从东南沿海入侵。以往封闭近二百年的大门,现在连墙都没有了,海防被英国鸦片商船轰开。

几乎又是一个七十一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又一个封建皇朝崩塌。

甲午战争是近代读书人的一个转折点:有些读书人依然走参加科举考试,企图求得一官半职,走光宗耀祖的道路。有一部分读书人则毅然离开了科举道路,进入社会的各种行业去做实实在在的事。特别在上海及其周边地方,文化、商业相对发达,有吸纳读书人的企业,这些企业给读书人提供除塾师以外的职业。这就是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有文化、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开始向上海结集。那儿有租界,清廷的力量达不到,可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存在决定意识,在那儿,人生活的第一目的是生存,生活的充实自然就想不起确属旧观念的朽不朽问题。“不朽”两字从此只在灵堂和挽联上出现了。

那时为了未来,赶上世界进程,社会的整个需要的是了解西方,



相应的是翻译书,即“西学”书籍,是大家新的关注点。其次适应教育制度变化,教科书成为另一个关注点。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收录的《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清末西学出版者概览》等三个书目所录书籍总共相隔时间不及四五年,所收录西学书籍近五千种,正是时代变化的见证。这近五千种书,出版者有近千家,在某种程度说明了关注西学出版的热潮反映了读书人近代觉醒。

书籍的成本里,很大一块是分摊的制版费用。一本书如果收不回全部制版成本,就意味这本书亏本了,这个出版者就很难再做第二本。所以这近五千种书由近千家出版者在出版的现象,反映了那些书籍虽然符合潮流,销售情况并不乐观。社会中的人是分层次的,衣食无忧者才能谈得上看书,买书。近五千种书由近千家出版者出版的这种现象,说明出版经营是很难的。其实,出版经营之难,仍然是今天出版界头等大问题。

既然书的制版成本是要分摊的,书业同业公会就有成本、定价的规定。定价规定里,制版成本规定以五次重印分摊消化,这实际是限制了销售少的书籍的出版可能性。于是,出版商纷纷以教科书为出版对象。教科书销量大,每册的分摊成本小,能获利。

清季,首先清廷仅仅规定了课程而没有课程标准。这就使出版教科书非常随便,或者说非常混乱。仅现在能见到有遗留课本实物的不下四十余家。编写课本是为人之师,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就可以的。好在有“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的传统格言,冥冥中起监督作用。然而课本是新玩意,经验少,又短少资本,这么多家出版者出版的居然凑不齐初小五年的主课用书,且不说能否有各课配套的质量。发行量最大的是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共七册。第1、2、3册是一个段落,第5、6、7册是一个高级段落。它是江苏无锡三等公学“随教随编”编撰而成。后来东南沿海兴学高潮,当时还没有